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二九期 ——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10a)

---

【编者启事】

- |   |     |
|---|-----|
| 【史海钩沉】“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怎样传播到民间的               | 莽东鸿 |
| 【春秋史笔】红卫兵，一种血脉！                         | 刘自立 |
| 【难忘岁月】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br>——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七） | 刘光耀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编者启事】

本刊 zk0608f 所载史义军“‘罗思鼎’和‘朝霞’事件”一文，系转载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据上海文革史研究者李逊来信，该文前半段关于写作班之事大部抄袭她的有关著述，后半篇关于朝霞事件则全部是抄袭她的《大崩溃》一书。为此，本刊决定将该文从网页中撤下。

~~~~~  
【史海钩沉】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怎样传播到民间的

• 莽东鸿 •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內，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 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据廖汉生回忆，当晚及8日下午5时至次日凌晨2时，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后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 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

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

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吴德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叛乱的迹象。”

从10月7日至21日，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等传媒，强调的是：“最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解放军报》特别强调：“一切听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9日、10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以及“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

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

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

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几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当天北京游行的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

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 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得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了“那四个人”是谁。穆青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玮子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哪,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二十七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地

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情况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

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在班车上，韦韬悄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一位同在五七干校受过审查的“难友”，“难友”瞪圆了眼睛，悄声说：“注意，当心谣言！”“放心，百分之百的新华社消息。”“那太棒了！这几个家伙早该有这种下场了，真是罪有应得！是怎样抓到的？”“还不清楚，只知道在前天夜里抓起来的。”

到了办公室，韦韬向同事透露了这条爆炸性新闻，大家都兴奋起来。室主任说：“这消息先不要外传，我去核实一下。”过了一会，他们被召集到会议室，一位部长说：“韦韬同志听来的消息是真实的，‘四人帮’已经在六号晚上被抓起来了，一个也没有跑掉。组织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华国锋副主席和叶剑英元帅，执行任务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现在中央还没有公布这件事，过几天就会公布的，在公布之前我们要守纪律，要保密，不要乱传。”

然而，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茅盾感叹道：“想不到，想不到这么快，真想不到！”又问细节，韦韬讲了，并强调说：“消息绝对可靠，我们部长亲口证实这不是谣言。”

《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

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

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啦！”

9日，在唐山考察地震的北京地质学院教师陶世龙赶回北京，在家中同妻子议论，认为迟群、谢静宜这些人也肯定跑不了，但是一想到那种“代代红”的人还在，仍然忧虑：“这回他们会真的被赶下台吗？这颠倒了的黑白能颠倒过来吗？”两人一时沉默无语。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中科院文学所乔象钟、蔡仪于9日得悉“四人帮”被捕，暗自窃喜。10日这天，从各方面送来消息，证实了此事，乔象钟兴奋得打着伞，穿着雨鞋，一家一家地告诉好友，直到夜间才回家。蔡仪则把他的存酒打开，逢有熟人来就举杯相贺。那两天又有消息说是有地震，人们也不以为然，有的人甚至说：“听了这个消息就是震死也甘心，因为中国人民得救了。”

一天，李可染上街，马路对面的女诗人柯岩看见了他，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了声“天快亮了”，然后就离开了。

北影严寄洲到生产区打长途，副厂长刘沛然正在屋子里手舞足蹈。严寄洲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刘说，没什么事，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

严寄洲回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颤，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 ◇ 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急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啦！”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的信息。回到成都，他立即做了宣传。有人还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破“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后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复又传回成都。

福州。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举行，忽然会议室外边的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来是游行队伍通过。在得知是庆祝“四人帮”被捕以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议也不开了，大家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灯火通明，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上海。这里多叙述一下上海的情况。

7日到京开会的马天水，对逮捕“四人帮”事持有异议，由于会议纪律，不能将“四人帮”被捕事，电话告知上海。

当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

8日，华国锋要求马天水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来京开会。

9日，辞海编辑所传出消息：“四人帮”三天前已被捕，这个消息是交通大学一位学生接到他高干父亲的来信以后披露的；这个学生和几个一同刷标语的同学，已被公安局拘捕了。在该所的职工大会上，负责人申斥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乱听、乱传谣言。他说，“我们一定要追查”，“中央局势十分稳定，革命形势很好，四位首长照常负责，马老已应召于前晚进京，昨晚还和景贤、秀珍两位通了电话……”。

10日，极力想了解中央事态的徐、王抵京。他们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议，得知“四人帮”被捕事。

13日上午，马天水、周纯麟及徐景贤、王秀珍返回上海。之前，华国锋、叶剑英与马、徐、王等人谈话，他们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晚上，上海市委召开市委常委、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文件。

14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上海一般群众。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涌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他们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后来，连工人民兵们也卷进游行的队伍。这样热烈、愤怒的队伍，经常首尾相接，使车辆无法通行。

农村的情况如何呢？

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回忆，“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了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

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她们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还有姚文元”。季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对！”季思聪回忆说：“我激动得头直晕，‘这回真的要变天了！’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了，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不揪谁都差不多。”

在另一个农村的大队部，广西知青钱文军和几个干部闲聊。公社广播站的崔会友闯进来，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接着喝酒庆贺。钱文军回忆：“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插队福建顺昌县农村的知青施晓宇，是16日得悉的。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董）丽娜（从福州）来，带来震惊人心的消息——中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这四位华国锋以外顶天的巨头，在毛主席遗体未凉，就要对华国锋采取行动，想抢班夺权，赶华国锋下台，但被华国锋察觉镇压了，现四人已被软禁。这个事件现只传达到10级以上干部，但很多人已经听说。据说福州街头已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和‘抢班夺权决没有好下场’的标语。……消息听后，实在令人又惊讶又欣喜。”

当然也有闻讯后怀疑是“右派政变”之类的，甚至有议论要“举行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的。上海、武汉、成都、吉林等地都有。

◇ 深受“文革”之苦的各界人士，欣喜若狂

徐向前得知后，连说：“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说：“中国得救了！”杨勇说：“真是大快人心！”余秋里说：“我的病好了，可以上班了！”谭震林兴奋得彻夜未眠，拂晓时才睡去，后来从床上掉到地板上也不知道。邓颖超立即去看蔡畅、康克清和刘伯承，和他们同享欢乐。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张爱萍兴奋不已，当即作诗一首：“忽报一夜阴霾散，扭转乾坤安国邦。白骨授首张正义，伟哉壮举永流芳。”

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的老干部，奔走相告，饮酒庆贺，觉得国家有了希望，党有了希望，个人也有了出头之日。

被监管在长江下流一个地点的管文蔚（江苏省副省长），举着一只酒杯送到在附近洗米的蚕种场徐姓职工的嘴边，要他喝。徐说：“管爷爷，这一不过年二不过节，喝什么酒啊？”“你先



别问，喝下去再说！真香啊！这可是地道的茅台……”

郭沫若张开双臂同许德珩拥抱，连说“大快人心事”。许德珩回忆说：“当时我们高兴的心情，不啻于第二次获得解放，绝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于树德说：“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定要报。”程思远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应了这句中国古老的格言，罪有应得！”

时任吉林省石化局局长的洪学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喜悦，他组织全局职工，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时任武汉市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的王健激动得手都颤抖起来，立即找消息灵通的负责同志打听，经核实后，他就不断地打电话，将这个喜讯转告给其他战友和同志。时任牡丹江地委书记的谭云鹤回忆说，“虽然尚未正式传达，但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好像是真的了。大家都喜笑颜开，三三五五比较要好的同志，纷纷相约，喝酒庆贺，一时真是闹得有点‘全国酒贵’的样子，听说有的小店酒都卖光了。”

文学艺术家们尤其如此。

黄胄热泪盈眶，只觉红日当头，眼前一片光明。王元化一阵狂喜过后，一口气跑到楼上挚友满涛处，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两人想说话却说不出，相互望着，默默地流泪。艾青致信友人徐勇奇：“把‘四人帮’砸烂，真是从心里叫高兴。这些人无恶不作，在这些人统治下，过的是白色恐怖的日子。现在，把这些妖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值得庆祝一百天。”关良特地上街买了几枝毛笔，又喝了几口平时从不沾边的白酒，当晚画了一张《三打白骨精》，“这时我高兴啊，我还真能在有生之年作画，热泪盈眶。”后来叶圣陶又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诗：“不辞反覆绘三打，想见兴怀玉宇清。石窟飞天堪媲美，如斯艺事倍精英。”

上海画家唐云喝了一斤黄酒，连夜画了《捉蟹图》，画面上一口大酒缸，三只酒杯，四只用绳子捆扎着的蟹。他还题七言绝句在画上：“三雄捉得又擒雌，不许横行放厥词；揭盖劈螯除四害，人心大快庆千厄。”西安画家石鲁同友人徐行连干了三杯太白酒，徐行写诗：“晨星光清夜路静，情满心舒步履轻。花逢时雨谁为俏，西行回首见户明。”石鲁则以“花逢时雨俏”为题绘画：一枝枯萎的月季，在蒙蒙细雨中复苏。然后又写了一幅“春到人间”的中堂。

南京女书法家萧娴从橱柜里找出瓶好酒，斟了一杯，自己对自己说：“喝了吧，愿天下从此太平！”一口干了！接着写了一幅对联：“明月千家满，春风一夜来。”魏克明作诗：“欢呼四怪倒台后，日月增光人增寿。人活百岁不稀奇，决心再战三十秋！”钟灵曾经编了不少对“四人帮”大不敬的谜语，结果被人告发入狱，又由于“四人帮”被捕，他只关了八天，就被释放。钟灵提着一瓶酒兴冲冲地跑回家，方成等好友正在他家等着呢。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找围裙，一下子钻进了厨房，边走边喊：“有话回头咱们就着酒说！”那天他们乐了半宿。

那时还在苏州访友的沈从文，19日致信上海友人程流金：“这么几天中，北京传来的新消息，和苏州市几条大街上的反映，对这次初听来‘突然’，其实却是‘必然’的新问题，把我们所想象的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我们的国家或许正应合了《易经》上提到的‘否极泰来’。”秦牧回忆：“只是在这时，我的槁木死灰一样的心境才真正复苏。我和广东许多作家一样，走上广州街头游行，所到之处，看见群众纷纷绽开了笑脸，欢欣鼓舞的场面，只有抗战胜利、解放初期入城式的场面可以比拟。可以想见人们对这伙政治恶棍怨恨之深。”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纵然历史风云恶，大笑高歌又一回！”

在“文革”初期就“几次都想死去”的曹禺，在听到女儿告诉他“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以后，他当时的感受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

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

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2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军民大会，庆祝华国锋担任中央中共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了“四人帮”的夺权阴谋。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席了大会。与此同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部队，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

从秦城监狱释放又被软禁在潼关的杨献珍，漫步街头，忽然发现到处贴着打倒“四人帮”的标语，远处传来鞭炮声和锣鼓声，他马上返回住所打开收音机……这位饱受折磨的八旬老人，一连几天都沉浸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欢乐之中。

刘海粟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喜讯，顿时热泪盈眶，连唤妻子：“伊乔，伊乔，他们落网了！”他激情地画了个风情万种身穿红袍的钟馗，题词道：“看惯千年鬼魅，依然嫉恶如仇。乌纱抛却更风流，换起香醪一斗。世上鬼多人恨，环球无鬼君愁。存弓忍把兔狐留，怎敢皆填海口？”

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当然，极左路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立即消亡。任重道远，只能有待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去解决了。

□ 原载《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

~~~~~

# 【春秋史笔】

红卫兵，一种血脉！

• 刘自立 •

—

红卫兵是什么？

这个提问来得蹊跷。

年纪一把的人不是都耳熟能详吗？但是，笔者以为不尽然也。因为，这个名词从它一旦生出，就被模糊化了；其层次之多，含义之芜杂，声名之狼藉，给诠释者一个也许是过度诠释的机会——或者说，给辩护者一个粉饰漂白的可能。就像人们厌恶造反派，但是还是有人心有牵挂，不能割舍。

红卫兵，老实讲，就是那些和毛，和刘有着血缘和政治血缘关系者。这个关系，排除掉全国以后挂上袖章的无数记准红卫兵。更为严格讲，这个红卫兵，就是北京的，那些以清华附中，

北大附中和后来被毛，周抓而又放的那一批“老兵儿”——也就是他们自称印下胎迹，实则纯属血脉沿袭者，世袭者。这些人和文革多数人，和造反与否，逍遥与否者，完全不是在一个政治生态内生存，运动和发迹。他们的政治游戏，既不是革命之游戏，也不是反革命之游戏，是皇权之下，八旗子弟之游戏——虽然这个游戏，在早年，因为太子论政，一部分人银铛入狱——但是还是因为他们血统和遇罗克不一样，而被老伯老姨们给放了。

这个游戏有过几次。文革那次，叫做联动式捉放曹。正是因为有周恩来之谆谆告诫的“不要做八旗子弟”而变得欲盖弥彰。所谓八旗者，乃革命后代是也！革命者，是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枪杆子里冒出来的那些农民。这样一些农民，到了当文化，党政权里，自然继承了某些据说是革命的衣钵，革命的传统。这个传统又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暴力遗传。暴力遗传，本来不是什么新货色，陈胜吴广洪秀全，就是暴力加集权（洪秀全还要到处基督教）。

这个传统在1949年以后多年，是一种革命对反革命的镇压。这个镇压带来的范式，子弟们见得多了，习以为常。到了1960年代中期，由于毛的被边缘化，他脑筋急转弯，想到，还是要回到被镇压者那样的革命性，反抗性上去，且逗逗子弟们，和他一起玩一玩。这样，66年，孩子们就看见他们爹娘老子革命时代玩一玩的暴力了。

这个东西其实是他们爹娘老子娘胎里带给他们的。这些党文化的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八旗们娘胎里的胎迹——就像那些如实说者云也！

这是文革戏法的第一层含义。这个含义也就是鲁夫子说的，革命特权论——阿Q类是享受不到这类革命特权的；北京校园第一张大字报几乎全部是子弟们的作品——人民，也是在榜样们率先大打出手以后马上跟进的——这个现象是国人的最最悲哀。

这是第一层含义，文革之红卫兵运动的深层含义。

之二是，老毛是儿子们的总老爹。他知道，在焕发出人民革命的极大热情之前，要焕发革命阶层及其儿女们的本能革命性，血统革命性。他知道，1957年以来，他镇压了右派，镇压了官僚（或者给了官僚一点点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颜色——他忽而反对苏联出兵波兰，忽而要求其出兵匈牙利……），革命资源本来很是枯竭。想要周恩来，罗章储们起来闹革命，怕是徒然。所以，伟大领袖自然想到人民革命时代的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人民，可爱的中国人民；一条腿是党。而党的革命性，在他看来，也很是衰落了，除了养在深闺人不识的江某人，革命性都销蚀在北京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里了。

三，孩子是人类的父亲。他知道，他们天生的革命性只要加以引导，就会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量，不像他们的在养蜂夹道的父母。

于是，一个唤起民众千千万的文革，是以毛唤起子弟们，做为开始。这个逻辑很难懂，又很易懂。跟随这个逻辑，就是毛罔顾1965年前后得来不易的稍微正常一点的社会生活，要开始毛式文革了。

我们要做出的补充是，毛本人是不愁吃不饱饭的。但是他看见1964，65年人民吃了几顿包饭，就很生气。他为此又是炮制理论，又是研究哲学，说是，人的卡路里不能摄入太多，就会生出两个脑袋，四条腿；他盛赞一穷二白；他要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他强调一种非人类的乌托邦，说是人定胜天，铁姑娘精神，王铁人精神。他根本就不对他的政策导致的，几千万中国人的饿死服罪。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那么，1966年前后，毛究竟要做什么呢？

许多学者做了研究。毛要发动文革，其实做了很多他吃饱饭以后的绞尽脑汁。他把那个在四十年代长春之战，饿死三十万同胞的功勋卓著者，领来炮制一通革命神圣宣言，叫做造神运动。其时，在中学开展阶级教育，要同学们响应阶级斗争理论，对敌人冬天般残酷无情……

饱暖思革命——这个说法很怪，不是饥民来造反——子弟们在封闭一团的集权社会里，忽然从缝隙里，看见了他们的父母打打杀杀的革命年代，被毛老爹一声忽悠，给带回到革命建设年代了。他们的血统血脉里世袭的革命筋络开始活跃。他们同时发现，他们爹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机会，在1966年，也是一声忽悠，从毛而降。

他们越发感到自己是革命的天生宠儿。他们对于人民刚刚吃饭，吃肉，很是不满意，和毛一样。他们开始琢磨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是一种从未受到压迫的统治阶层的人们的“革命”（人们说，其实是一种政变）——这个革命一开始就和革命的愿意相反——不要说他后来启用了所谓的斗争走资派这个口号。

是的，不是第三等级，而是第一等级中人发动了文革。这就规定了文革的全部反革命意义。

这个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中国政治词典里有一个词，叫做巴黎公社。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爹妈正是因为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公正的原则，才被纳入干部队列，享受革命者的非公社待遇。他们顾忌不了许多，因为，他们心中父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热血，开始在其腹腔汹涌。

这种革命荣耀观，对于老兵们是无法抗拒的——几乎就像主子反乱党，镇压阿Q，那样过瘾，那样痴迷——他们晚些时候高叫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如蝗虫般滚上北京街头！那种对于革命和特权的双重满足，在毛老爹的一声赞美中直冲霄汉。他们像1949年其老爹老妈们一样登上那个楼子了。他们聆听了，热泪了，忘乎所以，不亦乐乎了！

看吧，红卫兵，老子 and 儿子，在老毛面前双双俯首称臣，成为新一种继承和发展——虽然，臣罪，臣功，暂时还顾不上。（只是他们其实是戴盆，戴着个毛式大盆，就像刘少奇啊，周杨啊一样，不可以不戴盆。毛说，要你死于盆下，你呢，也只能无可如何！这是后话。）

这样，在万般皆下品，唯有出身高的党天下里，党之话语权，是结合了对党之“感觉权”的。（虽然，这个感觉权，是我们发明的新名词。）因为，在谁有权利感觉——这个问题上，阶级阵线极其分明；人民，是后知后觉的，要灌输之，他们的思维和肉体是被先进者操纵和任意画图的；在天安门上，对人民进行居高临下的感觉，正是感觉之最——这个感觉说明，文革的人民性之荡然无存。

这里，就更不必说对于牛鬼蛇神的感觉了——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不受人类保护的人了。呵呵，在此大一统的意志下，世间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要武嘛！”毛说！

于是，女生和小学生，也开始杀人，杀死她们的老师，校长。  
这个杀戮的意志被轻易地推向全国。

是的，为了建立一种共产主义公社，革命老将和小将没有区别，他们对于或者实在，或者

虚拟的正负产品，总是心向往之，不能割舍的。他们可以梦幻一个正数，也可以梦幻一个负数。现在，毛主席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赫鲁晓夫要来睡了，他觉得岌岌可危，于是，子弟们也做如是感觉——就是我们说的感觉权——也叫“有罪推定”权。

党的思维，党的意志，首先要让子弟们有所感觉，这是感觉的第一步——第二步，才是人民也感觉之，行动之。

老实说，这期间，确实存在一点点专利和原创。这个原始创造者，造反有理提倡者，是毛——其实是宋江，他的反诗比粪土万户侯，早几百年——毛也是原创，骆小海比起来是亚原创——因为毕竟，他也有小御用的才华。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如何写政治作文，领会一点点内部高层意图，是一个诀窍。政治老师老老实实，哪里有这些“先知者”“信息灵通呢！这些神秘主义可以写出很多内容。造反有理，就是这种互相通灵的党文化写作诀窍。

所以，决定谁有感觉的权利是第一步。一旦你的感觉就是党的感觉，那种快活常人无法体验——党文化一旦融入血液，全身贯通，你就状如超人，像是爬到埃菲尔铁塔上去一样，一览众山小了。有血缘者，有胎迹者之能事，如此。他们融会贯通地登高一呼，那还得了！工作组，老师，同学，……哪里还在话下。他们捉弄了刻板的小官僚，小工作组。

1964，65年，芸芸众生，在门楼底下的人民们，确实只是注意到可以吃饱饭了；国家也有了原子弹了；没有注意毛其实很不高兴。他们没有感觉毛的感觉。于是，全国万马齐喑。新中国，一点新鲜感也没有。毛，也差点躲入深闺——一点造反，革命的话语，精神，也没有，只有修养和螺丝钉。这个局面，毛不满意；这只是毛思想的一个方面——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于是，先知者知道了毛。他们早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也爆炸一个精神原子弹——叫继续革命。

事情在毛的革命意志左右下开始起变化。1966年的春夏之交，是毛的浪漫主义加革命的事发期。事情变化到某种程度以后，毛知道要加温发烧。一如早期的人民革命，他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先要唤起蛊惑者——现在，他先是唤起骆小海，唤起彭小萌。后者，不愧是血统中人，一触即发，就像被点燃的炮竹。

## 二

可是，这个炮竹的制造和锻研过程可是不自今日始。

比如，1964，65，66年的党就透过一系列的传媒，工具赖以进行制造文革炮竹的系列实验。

其间，毛的革命教唆是不是起到一点作用呢？

我们还是要看看中小学，尤其是重点学校里进行的阶级斗争教唆。在我们比较熟悉的类似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就有对于一般接班人的教育和“直接接班人”的教育之大区别。这个区别，一言蔽之，就是说，你，是要接你爸爸的班的。这个爸爸，一般而言不是司局长干部，至少是部长，就不要说政治局的子弟了。

干部子弟的特权，如何激发其革命和造反精神？固然，政治局里还是意见不一致的。一说，是要培养哈军工式的技术人才，要实干，实干保江山；另说，就是毛式教育，读书无用论，政治压倒一切。但是，无论是哪两种，他们的子弟兵是优待在先的。1957年，毛给了赫秃子

四十亿美元买原子弹，赫秃子答应毛上莫斯科。

毛在那里对子弟兵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子弟兵们很感动，很感觉了一番。后来，宣传告诉人们说，青年人都是八九点钟——这个说法就不对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人家是在说家里的事情，直接接班人的事情，你们跑出来，我们也加入吧！呵呵，谁他妈让你加入的！（无独有偶，前几年，一个华裔美人，一度在北京上中学，她不甘寂寞，把这个八九点钟又搬上荧幕。她果然邀请了毛在四十年前就特支持的那些鬼不鬼，人不人的前子弟兵。他们在屏幕上呈现一团黑影。）

在小学生，中学生里，不太注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者，毕竟是不懂得他们的同学和家长在搞些什么明堂的。

他们也不知道家长们向老师们透漏了什么信息。但是，他们毕竟看到，比如，“四个第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睡在我们身边的”，云云。学生们一般不太懂。但是，熟悉党意志的小小子们就懂，他们就比一般老工人，老农民，甚至老知识分子，要懂，要懂得多。你看，骆氏就懂。

骆氏就知道，人们才开始吃饱一点，毛就有意见，要反对。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毛发出的一系列造反之论，骆氏就听得个满坑满谷。毛一个“造反有理”的语录刊出在人民日报上，这个举动是不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凡人不知所云，骆氏可是先知先觉，比别人快半拍。他说，造反有理，他1965年就研究之。（见他近期文章）此其一。

其二，他们当然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据说，不是5月底，而是6月初，清华附中成立了红卫兵。原先他们炮制5月29号成立红卫兵，好像比聂先知先觉。看来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后知觉。

其三，他们终于把他们的造反文章交给江青阿姨了。骆小海从此成为党史中的一名小御用，荣载荣归。直到今天，还是媒介和网络的发烧友。事情的本质是，如果骆氏的荣载荣归只是他个人的名誉，倒也罢了。可是，中国红卫兵之举，造反之举，实在是戕害人命，屠杀无辜，灭绝人性。试问，这个荣誉是不是太有点纳粹味道，法西斯味道呢？

可惜此骆并未对此加以强烈谴责——一句，我去读书了，就万事大吉了。

NO！

红卫兵们要对红卫兵的诞生和创造本身，做出起码是道义的厘清，悔过和谴责。你们登上那个楼子和毛沆瀣一气，致使起码北京，就有将近七、八千人在红八月死于非命——难道你们不应该说一句红卫兵滥杀无辜吗！

我们过来人对于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万岁！”记忆犹新。虽然，其间，已经出现跟在老兵后面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起来进行文革——毛许诺天下大乱；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公检法不可以管——谢富治禀报红卫兵杀人，毛说，好人打坏人，活该！云云。真是丧心病狂了。

追究人民的责任，是很残酷的。但是，国人并未抵制第一波红卫兵，而是效法其野蛮，其暴虐，形成全国的武革运动。

人们从这个伟大兵史中究竟看到一些什么？

人民，是不是在看到了红卫兵的创举之后，开始了某种抵制和逍遥呢？没有。“人民”革命，一说是“人民文革”，开始了。

究其原委，“人民”，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原来是独裁者的造反和革命工具，他们没有私人性，没有属性和良知，只有符号和工具的意义——也就是说，人民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他们开始争取那个看来在阿Q身上被褫夺的革命权——许多非出身纨绔者，非出身子弟者，蒯大富和聂元梓者，也就纷纷出笼了。他们说，革命是人民的节日。

这当然是毛的战略步骤——要让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类打头炮，要让大学跟进，要让子弟们在完成石破天惊后，再“不须放屁”，歇菜，要让蒯氏一类帮凶，再来一遍革命，和革命后的歇菜，进班房，一生想念毛（说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

有人说文革是57年的翻版，57年是流产的文革。此说有理。毛在1957年调动知识分子批判干部，再调动工农分子批判右派知识分子，再调动干部阶层批判周恩来（说你离做右派只差五十步）——他把国人的人头，阶层和阶级资源像耍猴子一样——耍过，用过。他好像大获全胜，开始与天斗，其乐无穷了。

于是，三年饥荒，毛饿死几千万革命人民——而中国的奇迹是，人民依旧喊万岁！

有人说毛不好控制文革——试问，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他都控制了，还控制不了文革吗？

问题是，不是毛控制与否，而是事务是不是走到极端——4.5，是走到极端的开始。以后，有了毛后的89年……事务是不是走到头了，人们还是各说各话——这正好说明他们没有走到头。

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回到我们开始时说的，关于血缘血脉和非血缘，非血脉问题——红卫兵是子弟兵，蒯大富可不是一——所以，红卫兵文革后一概太平无事，而老蒯，就要蹲班房了。这个就是党文化里在法律面前，人人有别，天地之下，惟我独尊（这个我，就是我们——就是他们的徒子徒孙）。

问题是，这个简单得一清二楚的课题，人们今天还觉得是个难题。他们总是说，联动冲击公安部了，老兵反江青了，干部子弟也读书了……

他们不想想，遇罗克被抓，他周恩来怎么不对杀死遇者说，为何“不教而诛”呢？遇，何许人也，整个太子及其爹娘的否定者，不杀，杀谁？

有人说，这个捉放曹，比不捉，不关，还要不公——道理在此。

不太懂得子弟兵是由的深层规则，就不懂他们爷爷奶奶，爹爹娘娘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就是，王子犯法，就是护法。

有人说，毛何以废弃了老红卫兵，而启用蒯大富呢？

这是文革得以进行的关键。关键的关键，不是毛要杀死八旗一族人，而是要把反对派打倒。打倒刘邓（刘邓有别），不是要连锅端，而是不要刘邓合灶——就像他说过，不和老蒋合灶——而非把锅砸了。就是说，这个体制并未触动丝毫，反倒是坚如磐石了，牢不可破了。

毛的原则是革命——革命是不是吃掉自己的儿女？就仰赖于他们是不是真儿女，血缘儿女。革命并不注重精神上的儿女，更不注重帮伙和干将。他们被打倒，是因为违反了潜规则；维护了显规则——这是他们不懂辩证法。

试问，革命吃掉过他们的真血缘，真儿女吗！你说得出来吗？他们不吃自己的儿女——这是国事之一大特色。

有赖于此，毛，才把文革之发动权，推给了子弟兵——其意深深啊！

这里的毛支持红卫兵，有几个理由。

一是，只有豢养的子弟犬，才有胆量敢于咬人，乱世，杀戮——因为如前所述，他们的爹娘就是干这个的。

二是，他们是王子犯法，庶民无奈。毛知道他们的优越感。

三是，毛对之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因为他们是儿子，连同其爹妈，都是毛的儿子。父命不可违！

换言之，若是毛不把对骆们的煽动看成自家之事，反倒是不好理解。

人们遗憾地，颠三倒四地炮制各类说法，以证明毛和红卫兵如何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启示，甚至发展到毛之天下，尚有民间组织这样一个神迹——说，红卫兵是自发组织，红卫兵启发了毛，云云。这可真是颠倒黑白，置天地于倒悬。儿子不可以违抗父命——这个中国特色不可以须臾有悖之！

有人把红卫兵的行凶归结为他们是喝了狼奶至此。

换言之，首先，狼，是存在的；二，小儿们正在吃狼奶；三，吃过狼奶以后，他们就转化为狼群；最后，狼是要吃人的。

狼，是不是在吃人呢？答案没有什么出入，狼，吃掉无数人。

问题在于，狼吃人的特权是不是狼爸爸给予的呢？狼仔子们，是不是闻到一种 66 年特有的血腥，而变得如狼似虎起来呢？

他们这些狼仔们的活生生的存在，究竟是不是狼性教育之结果，之包装，之美化呢？清楚文革者，当然很清楚。

我们的提示则是，正是这些从人群里脱颖而出的“人狼”，才有办法，有权利，成立狼的组织红卫兵吃人或者杀人（真正的吃人也是存在的；这个已经尽人皆知）。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死气沉沉的国中，这些血脉，这些人之翘楚，人之强者，人群之狼，第一波开始吃人，杀人。阳光灿烂的屠杀，现在朗朗在目，霍霍有声了！这个历史的事实无数人做出辑录。

从北京 1966 年 6 月份开始殴打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卞老师；8 月 5 日，卞老师被活活打死；8.18 以后，大规模的杀戮开始，子弟兵的作用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狼的合法组织，就像纳粹创立了党卫军，可以杀，杀，杀。



你看，毛在楼子上说，我支持你们！

林彪鬼蜮一样的声音响彻古老的京城：“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三

1949年以后，无人敢于造反。地富反坏右，一般的良民百姓，不要说造反了，就是想起来也要暗怕三分——他们会要造反，会要革命吗？不会。

其二，学生里，懂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者，人数很少。政治老师也不懂造反有理——他们怎没会懂呢？他们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是螺丝钉。造反说，自然他们听得很陌生。他们没有造反的思维资源。

三是，阶级斗争年代，自然敌对阶级及其子子孙孙，是不可以丝毫有造反之心的；有造反举动，更是该天打雷轰，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会要造反。

所以，毛的造反给谁看，煽动谁，很清楚。

没有人批露，究竟是什么人，直接或者间接地，把可以成立杀人组织这个信息，透露给红卫兵。

我们知道，起码，前述先知先觉者，其实，是后知后觉者，他们看到了毛的“造反有理”的“告示”，于是，蠢动于斯，以期挺毛。这个双簧演出得很成功。

毛在他的衙门里印刷了这些丑陋的文字。

他如获至宝，说，人民是对的，红卫兵是人民，所以，他们是对的。

这个逻辑推导，与其说是推导不如说是强辩。他说了，红卫兵是对的，于是，这个狼群就果然开始吃人了。

吃人，杀人，残害无辜，这就是“造反有理”。这个理，就是狼之理。无论谁参与到狼群里，他都是吃人者的一部分。红卫兵创始人说，他们不是吃人者，是反对吃人者。这个说法很怪异。我们只是承认，一些狼群中狼，也许没有吃人——其理由若许，并不重要，因为它无法改变狼在吃人这个血腥的事实。

二，组织这狼群的人们，为狼群的吃人起名叫“造反”，“革命”；把这个吃人的组织叫“红卫兵”——这就是狼群中那些最初演化为狼性人群者的极大罪恶，虽然，也许他们在完成了狼群的预备吃人之演习，舆论先导后，退到一边，他们莫名其妙地没有吃人——但是，他们是吃人行为的精神创作者，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历史定位。

这个精神吃人的‘三论造反’，使得全国上下进入我们说过的“疯人院”——阿伦特说过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疯狂，概缘起于红卫兵和毛互相叫嚣的造反和杀戮。

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血腥和杀戮——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是道德底线的践踏，辱没和罔顾。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首创者是不是真的杀人，已经变得不重要，就像毛，希特勒自己，并不需要去执行枪毙或者挥舞棍棒。

值得注意的是，红卫兵中人，至少应该对文革的血腥抱有悔罪的态度，但是，狼性使之拒绝。

那么，红卫兵是不是继承了他们的父辈的革命传统呢？

这个传统的价值判断又将如何？

这个革命和以往的杀戮，异同如何？人民，国家，文化付出的代价又是如何？

革命的儿女们，迄今，究竟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呢？

……文革起因多多，但是文革不是革命。这个结论实在很容易得出。法国革命也好，美国革命也好，以后的1917年和1949年革命也好，其共性在于改变了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虽然，前者是民主和宪政的酝酿实施，后者却恰恰相反，他们违背了二月革命和蒋介石的有限专制，转变成为毛式和斯大林式独裁，极权。于是，我们看到，为了一个民主未来而实行的杀戮，像1792年那样的杀戮固然可以谴责，但是，她至少产生了不能恢复绝对君主制的良知（见夏多布里昂的说法）。

文革之杀戮带来了什么样子的，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局面呢？

它改变了什么样子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呢？

它把历史，人民，文明和文化拖向何处呢？

一切进步性——虽然也许带着血腥——都没有发生；一切，在原地踏步，原地后退；正像有些学人所言，反对任何所谓走资派，加剧了毛式独裁，甚至把刘邓时代的相对正常生活和基本常识，加以荒诞化，疯癫化。而红卫兵杀人，和1792年的暴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言。因为，关于暴力的正当与否，列宁们，毛们，是振振有辞，不作退却的。于是我们要问，红卫兵的杀戮，有何任何正当性？

它与时代，社会，政治的任何进步变动，有无任何关联？

回答是，没有。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是因为“一切人”，都不具备起码的人性和人权。在此大框架里，只有一个君主，一个僭主，一个独裁者。这个游戏的杀人部分，也是秉承他的旨意，和任何反对君权，反对贵族，反对资产者，毫无关系。

杀戮秉持的目的性，完全是毛的个人意志和情结。这个意志，甚至不具备任何历史目的论的思维——因为，毛切断了历史——不像第三帝国要施行它原来梦寐以求的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恺撒的独裁——那都是扭曲的西方文化之所在。而毛是农民，他只能产生游民文化及其糟粕。在这个类似水浒杀人的游戏中，锄强扶弱的良知选择，做了反良知的选择——锄弱恃强——这个杀人价值，不如宋江的价值观。

故此，回忆红卫兵历史，就是回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意义残暴。

究其根源，文革和红卫兵运动，乃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和文明价值为 0 的政治兽行。

所有国人，尤其是参与此行为之人（包括笔者本人的非暴力参与之），都相对有责；更不要说是“创造”了红卫兵者，该对此历史尤其做出中国人不曾有过的“忏悔”；忏悔这个奇耻大辱，国耻和族耻。

不幸的是，这类忏悔，根本没有发生。

我们不试图解释某种东，西方文化比较，也不试图做出国人是否可能产生忏悔文化之析。我们说，这个文革之耻，现在，正好因为没有清算，正在颠倒评价，黑白混淆，甚或供奉其为法宝和圭臬。其中要因是，红卫兵的杀戮，链接六四杀戮，被提升为新旧文革的革命道德。少年中国笔下的中国少年，已经代沟如壑。他们忘记文革，无知文革。对于面对他们的历史空白，其回报以历史感和价值感的空白；更不图反思革命或文革中的特权阶级，八旗子弟对其父辈，父辈的父辈做出的伤害。于是，杀戮的逻辑迅速转化为别一种表现——绝对的权利和绝对的掠夺……

归根结底，这些原先的子弟，今天的统治者，不会因为他们的暴力风格是否过时而产生任何忧患，自省。他们笃定“相信未来”——相信那在红八月飞舞的铜头军用皮带和鲜红的呢子袖章……

更毋庸说，历史发展迄今已经证明了他们四十年前的话：我们是国家的领导者，你们是建设者。

虽属大不幸，但此言言中。千言万语，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说对了——国家，就是他们的国家，就是八旗之天下。

没有人会对这一点做出另一样判断，除非，他生活在梦幻里。

问题在于，四十年后，人们如何思索这样一层人，这样一层血脉，这样一种皇权，何以会如此挥之不去，日久天长。人们用黑格尔的话解释着，说，一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这些在 78，79 年，源于一个文革前干部子弟要提拔的党的文件，占据国家要津的前红卫兵们，指望他们来清算文革吗？

指望那些说“红卫兵问题一风吹”的老同志，老同志之子来批判红卫兵，批判文革吗？

指望他们这些“直接接班人”，来为他们打死的卞老师等死难者平反伸冤吗？

NO！

~~~~~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 刘光耀 •

## 十五、“紧跟伟大战略部署”

“文革”之初，毛泽东就把青年学生当作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但一部分造反的学生到处制造事端，挑起大规模武斗，到1968年夏仍然制止不住。毛为了扭转局势，于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见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毛泽东指出：“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于是，在8月19日，毛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提出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高校领导斗、批、改，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等。这就是毛泽东的新的“伟大战略部署”。他想在半年内完成这些大事，而后召开中共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从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曾在中国大地上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运动”，又被“红卫兵的最高统帅”的几句话，扫出了“文革”大舞台。他们成了罪人，成了林彪、江青两个祸乱集团的替罪羊。

### 1. “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学习班”

1968年11月中旬，驻开封师范学院数学系工军宣队，根据毛泽东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提出的“凡是革命群众，都要实行大联合”的指示，举办“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学习班”，成员三个人：陈顺卿、李天增和我，工宣队队员荣全法师傅负责。从学习班名称猜测，可能准备解放我们这三个人。每天学毛着，读文件，谈认识。上班开始，向毛“早请示”，下班前向毛“晚汇报”，朗诵毛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荣师傅要求我们准备检查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

我应该检查什么呢？怎么检查呢？3月29日，妻子于吉林给我的婚后第一封信中，就曾向我提出：“要虚心向造反派同志学习，改变自己的立场。我现在老在考虑你这个顽固的‘保’字号，能否正确认识自己？……那天八二四同学特为这事由几百里以外赶到咱县，这是对咱们的关怀，望你能正确理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谢造反派对自己的关怀。”我是4月4日晨得到这封已被拆、审的信的，4月1日我已被点名批判。我读后在信尾写了一段话：“淑珍的心是好的。但我该如何认识我的‘问题’呢？！真不明白！！”4月14日、29日的两封信，都谈到这些问题，她的忧虑越来越重，还要我把检查寄去一份。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写过检查，也无法写。妻子是永吉县“红革会”的头头之一，吉林的“红革会”被中央肯定为“革命造反派”，而与其对立的“炮轰派”，被定为“犯错误的造反派”。“红革会”类似于河南的“老保”组织，“炮轰派”称他们为“黑二保”。妻子在给她的许昌至好写信时谈了我的事。许昌那对夫妇也特别关心我，就给我写了封长信，专论河南的“文革”造反派，帮助我认识；还引用斯大林关于“过火”的论述来说服我。他们要我回信答复“挨打了没有？被斗了没有？”挨打、被斗的事不好回答；认识上的事，也难以向他们靠拢，只简单复信应付了一下。6月下旬，男的来开封出差，想找我当面深谈，但在师院住了三天，没有找到我，失望而去。后来，他们又寄来一封长信劝导我。可我仍然想不通。

学习班过去快一个月了，思想还没有理出头绪。一天，在接荣师傅给我发的毛泽东像章时，忽然想起使我心酸的事，止不住呜咽起来，越哭越痛。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莫明其妙。荣师傅以为我隐瞒有“重大问题”，“对不起毛主席”，就拉我到一旁单独谈。其实，是因为在我进学习班以前，看到许多人都领毛的像章，我也向管“牛”的学生请求发一枚，但被拒绝了。我很伤脑筋：我连佩戴毛主席像章、热爱毛主席的资格都没有了！今天工宣队发给我，说明对我的政策有变，就激动了起来。这是我第二次痛哭毛主席像。我深思许久，认清了一条：我不能让工

宣队失望，得好好检查，争取过关。

我反复读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经过几天思考，终于在12月18日写成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检查，名曰《向毛主席彻底认罪》。题目是经过斟酌的：我只能向毛主席认“罪”，而不能向造反派认“罪”。大段引用《公报》上的句子，“思想认识”占了一大半。除了“犯罪事实”外，当然说了不少违心的话。譬如，按照《公报》的说法，承认给“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定的性质等等；给自己扣了许多帽子，如“充当了刘贼一伙……的可耻角色”等等。这是我“文革”中唯一上交的检查。

说“违心的话”，这并不是我“文革”中的第一次。1967年1月，在遵义队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了稳住我们的队伍，继续同造反派抗争，我同意“要明确我们今后的大方向是批判刘少奇”的说法。在1967年12月到1968年1月，在为“左三红”写的《告全市人民书》和为开封师院井冈山写的《上访提纲》中，写了更多违心的话，那是为了和八二四实行“大联合”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妥协让步策略。这一次在我的“检查”中说违心的话，则是为了“蒙混过关”。说实在话，用的标题《向毛主席彻底认罪》也是假话。我何罪之有？我打心眼儿里倒觉得是毛泽东错了。我相信，像有我这样想法的，还有相当一些人，只不过不敢说而已。如果说了，就必然得到张志新喉被割、被处极刑那样的下场。不要说毛泽东如何，就连江青或比她低一些的“文革派”大官，敢说吗？顶多，两口子在家里私下议论议论，而断不可公开讲的。我老婆曾对我说过，当她得知“文攻武卫”的口号是江青提出的时候，她对江青非常反感。但她从未对别人说过。而我对我老婆，除了可公开讲的外，什么也不说。

我们三个人的检查都准备好了。工宣队先让李天增在全系大会上检查。经过评议，合格，宣布解放。隔了一周，让陈顺卿和我检查。陈顺卿言语罗嗦，（大概因为有些不是他内心的话），检查了近一个小时，我照稿念了半个多小时。评论时，对陈顺卿提了不少意见，而对我的检查倒没有提出什么。会后陈和我开玩笑说：“刘光耀会检查。”还有一个同志说我：“把啥都归结到‘私’字，哪有那么多私心？”能否解放，是让我们离开会场后议的。有学生说：机关卢树森比刘光耀的问题小还没有解放，刘光耀也不能解放。于是，这一次宣布：解放陈顺卿。把我挂了起来。

## 2.赴灵宝斗批改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于是，开封师范学院除65级外的各年级学生都“毕业”离校，分赴几个解放军农场劳动。

1969年元旦，开封师院教职工和65级学生，向灵宝县朱阳公社迁移。大家坐火车，我押运装载行李的大卡车。一路颠簸，晕得我呕吐不止。数学系和教育教研室被合编为六连，下分六个班，班长由学生担任；驻干沟大队第二生产队，在老乡挤出的窑洞或房子里睡大铺。整天学习、开会，“清理阶级队伍”。刚开始没有厕所，大家跑老远解手。我借来工具，依地势挖厕所，几个学生也来帮助。夜里下雪，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就悄悄起床，从宿舍一直扫到相距二百多米的厨房门口。

2月初，我被宣布解放。接着，戴鸿儒也获解放。

春节不放假，也不准请假。教师张佳魁的家在灵宝县，驻地离家不远，也不准他回家看看。结果，他“造反”了，不辞而别。返朱阳后让在全系大会上检查，引起一些学生的同情，他们

公开给工宣队提意见。

缺柴烧，工宣队领着一班人住在很远的山上砍。砍了几天，挑回来。那时我很有力气，比谁砍得都快，挑得都多。我们不认识漆树，好几个都中漆过敏。我的头皮，胳肢窝、阴部都出满了红点，很难受，吃了药，昏迷三天。

4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新党章。驻校工军宣队让各连跳“忠字舞”（秧歌舞）。六连从组织练习到正式表演，我都故意排在最后，只跟着做样子，而就跳不起来，虽然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舞蹈表演队的主角。也不知为什么，总感别扭。

参加了麦收。此外，并没有什么劳动。所以，老乡把“开封师范学院”戏说成“开会吃饭学懒”。

在朱阳，我被评为“五好战士”。

### 3.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始于1967年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是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军宣队的方式，把“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在大学，知识分子成了主要清理对象，使许多老知识分子受迫害，有的年轻人也遭厄运。

1968年夏，开封师院一批有历史问题的“老反革命”和新的“现行反革命”就被揪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夏季甚至到秋季。在1969年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参加专案工作的，不分“老造”、“老保”，而且“老保”起了主要作用。

数学系出身于烈士家庭的29岁的教师常呈才，因为多年前在教师中传过听来的一些“有失”毛泽东尊严的话，又因他是个“老保”小头目，造反派就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多场。在灵宝，他说冤枉，而又遭大会批斗，直至入夏才宣布解放。

数学系和教育教研室的“老反革命”的历史问题，早在1955年肃反时都已有结论，除一人“确系历史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论处”外，全属“一般历史问题”，可现今都又给掂了出来。据说又发现数学系老教师底钟英隐瞒有重大历史问题，无论怎么逼，底也不承认，最后经请示省领导，在灵宝全院“宽严大会”上以“严的典型”（只1人）硬给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到9月份又给平反。

教育教研室的王汉澜，因其夫人和解放前夕的开封城防司令张勋亭家有亲戚关系，在河南大学迁往苏州时，曾在张家住过；又在张勋亭回开封期间去看过张，张后来逃到台湾，就怀疑王是和张有联系的台湾国民党特务。也怀疑张的姑娘、数学系工作人员张华英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在灵宝对王、张二人严加看管，隔离审查。王、张不承认，就不让其睡觉，对其采用车轮战，还多次按住王的头往墙上碰。王被逼得感到活着没意思，就跳井，经抢救未死。

“文革”中开封师院因清理阶级队伍被逼自杀身亡的3人。1967年秋，副院长、中文系三级教授钱天起被隔离审查，被造反派工人打得遍体鳞伤，公安人员也找他谈话。无奈，他把草帽挂在窗子上，吊住脖子，跪爬下死亡。1968年10月2日，外调人员找化学系教师于学海（摘帽“右派”）调查，说他不老实，外调人员一走，就被几个学生毒打一顿，并被关进一间屋内。下午，两个公安人员找他谈话，他仍说不知道调查者提的事。当夜，于学海上吊自杀。1970年秋，师院从杞县回校后，墙上一条标语被风吹掉了几个字，构成“反标”，怀疑是地理系干部辜学文（造反派）所为，在隔离审查期间，辜学文跳楼身亡。

#### 4.母亲的灾难

母亲知道我们春节不放假。淑珍从吉林回偃师二十多天了，也一直不提来灵宝的事，母亲就犯疑，在和淑珍的伯母谈起时，掉了眼泪。在家人的动员下，淑珍决定来灵宝看我。2月15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晚上，正和母亲商量第二天来灵宝的事，突然，母亲猛坐在椅子上，唔啞了一句，可以听出她的意思是：“我不会说话了！”忙请乡医来看，说是中风——脑溢血。从此瘫痪，18天全哑。她已经患高血压、心脏病半年多了。

春节过后，淑珍和他弟弟坐火车到灵宝站，拄着棍踏着深雪，步行60里，来到朱阳公社干沟2队。棉鞋湿透了，大师傅尚守真给烘干。当晚全院开大会。会后，请荣师傅向蔡说明我的问题的性质。因为蔡在1968年11月份给我的信中说，她们正在整党，要填表，问我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我无法回答，谁知道最后人家会给我定成什么性质？就在回信中说：“如果什么时候你听说我被定成敌我矛盾性质，那你就立即宣布与我解除夫妻关系。”当然，我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结局。淑珍从不在别人面前掉泪，读了我的信后，跑到野外大哭一场。接着给我写信说：“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对你是铁了心的。”她在灵宝只待一天就回了偃师，并按时返回吉林。

淑珍返回吉林后，我给母亲写过两封信。她听了第一封信后，说想我，意思是让我回家看她。我在第二封信中说不好请假。当伯父念给她听时，她就不相信是我写的信。她说：“您都别哄我了，那不是光耀的信，光耀到底咋了？就是死了，您也总得叫我知道啊！”大家劝她不下，伯父就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我。我没有读完信，就忍不住跑到后山痛哭一场。回驻地，把信交给班长张忠伦，他看着信也掉了眼泪，说：“我去连部给你请假。”准假两周，立即动身。乘长途汽车，在灵宝转火车，到偃师站大约是次日凌晨三点多。我头晕得不得了，就在马路边躺了个把小时。天不亮赶到家，母亲仍卧床不起。她见我晕车难受，就让我嚼几片生姜，什么高兴还是不高兴的，一句话也没说。归期到了，我按时乘火车到灵宝站，然后步行赶到朱阳干沟，避免了晕车之苦。

#### 5.回师开封，“刘光耀分裂党”

1969年6月初，开封师院由灵宝回开封。六连由原党总支副书记徐振群带领一个学生和我作为先遣队先回，安排住处。8月初，经院工宣队队长批准我两周假去吉林探亲。接着，院党委和各党支部恢复，书记由军宣队主要负责人担任。

9月份整党。工宣队员和系革委会负责人，不管是否党员，都参加。我虽不是党员，但由于整党的目的是增强党内团结，进而带动群众团结，我就很关心。田继善，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在新乡师院上学时我们的大班长，同来开封工作，我请他作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认为，整个数学系教工团结的关键是党支部内部的团结；而党支部内部团结得如何，田和另一位党员的团结又会起重要作用。于是和田商量，我想和另一位党员谈谈，为他们二人沟通。田沉思良久说，你试试吧。一天晚上，我去那位党员家玩，当着他夫人的面表明了我的意思，其中有一

句话：“党内有不团结现象”。第二天晚上，我到一位要好的党员屋里聊天，他说，下午的会上，一位负责人说，“有人在下边搞小动作，破坏我们党的团结，说我系党员分两派，有意分裂我们党。”我一听，感觉不妙，像是指的我。准备应战。

过了好几天，系工宣队队长（他并不是党员）代表党支部找我单独谈话，劈头就问：“你怎么说咱系党员分两派？”我立即站起，怒不可遏：“是谁告发的？叫他来和我当面对质！”队长忙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并说：“我们根本不相信你会那样说，我是故意认为你就是那样说的，这是我们事先研究的策略。别生气，也别再对任何人讲这事了，要相信我们会正确处理这件事的。”从此，再无人提及此事。其实，“文革”一开始，中共党员就分作两派，以后有些“老保”党员转向造反派，有的多次反复转向。开封师院数学系的中共党员，本无造反的，在“一月风暴”中，也只有个别党员转向，并反戈一击，而且以后又反复几次。这是铁的事实。为了走向团结，我只说“有不团结现象”，而回避“分两派”的事实。

整党结束后，工宣队把揭批我的材料当着我的面烧掉，并退还我的书面检查。

## 6. 辗转杞县“一打三反”

1969年11月，开封师院又拉向杞县林场“斗、批、改”。1970年，搞“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杞县，六连未抓住一个反革命，而在1971年初回校以后，政治嗅觉灵敏者，在开封师院六连宿舍楼上一个大空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一张毛泽东像，上边有烟头儿烧的洞，还有痰迹，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为。于是，就在吸烟兼好吐痰者中查。查来查去，怀疑到张佳魁。经谈话，张不承认。让张写检查，张闷坐在一间房内的桌前，不停地抽烟，一个字也没有写。张佳魁，贫农家庭出身，具有十多年党龄。审查者查不出张有任何作案动机，也就不了了之。可是，这件事从精神上对张佳魁的打击太大，他认为在开封师院混着没意思，就提出调离，但领导又不放。经过两年多的磨蹭，才调他回家乡教中学。他走时，我一人送他到火车站。走后，从未向师院任何人来过一封信。

有的连队抓住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如一个党员干部在让写字对笔迹以查（把“国”误写成“华”而构成的）“反标”书写者时，他未听清主持者的意思，把原“反标”写了一遍；另一个党员干部的读初级小学的儿子，写字时写错了字，这两名干部都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审查几个月，还公开批斗。

实在没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打击，就整一些人的“经济问题”。数学系有极“革命”者提出我在化肥厂“打、砸、抢，砸保险柜”问题。1968年，在我被批斗审查时，就已经把我的穿、戴、盖的来历一件件写清楚，每一件至少提供两个证明人。砸保险柜的事，我也写得清清楚楚。连部派一位工宣队员、一位干部到开封监狱提审那个砸保险柜者，他的交代和我写的事实完全一致。连部领导当众宣布结论，才算了结。

在杞县既无可打又无可反，就玩吧。星期日，到远处甚至到毗邻的扶沟县去赶集。平时打排球，下军棋、象棋，打扑克，还有学生连续几个夜晚大讲所谓《梅花党案》（所谓李宗仁的夫人搞的“特务组织”案）。我和几个教师则种些蔬菜，以补无聊之暇。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形容当时的状况：“三餐两觉一盘棋，二胡笛子扑克迷。公子小姐谈恋爱，篮排球场鏖战急。”大家戏称这种斗批改是“斗批散”。

## 7. “教育革命探索”



1970年夏，六连到尉氏县开封师院办的农场，参加麦收劳动。尔后，65级学生“毕业”离开我们。再后，又搞整党补课。

“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教育，被说成贯彻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封、资、修”的一套。毛泽东在1968年曾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还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70年秋季，开封师院转入“教育革命探索”。看样子要准备招生了。六连领导分配李廷杰老师和我到省教育厅有关单位调查访问教改情况。调查访问完，恰值中秋节，我回偃师探亲。蔡淑珍已于1969年11月调回偃师（原来我们准备到适当时机“向中看齐”，调往郑州；反正我不愿呆在开封师院，所以，才让蔡先调回偃师）。我的儿子已经出生近4个月了，还没见过面呢。偃师教育界教工在集中搞“一打三反”。淑珍的单位领导对我们挺照顾，把卫生室腾出来让我们住。据说，有一位管理伙食的女教师因“经济问题”受审，她丈夫从西安回偃师探亲，连大门都没有让进。我第二天即回开封。

回偃师的当天晚上，我去看了我姨。姨父向我讲了县磷肥厂“一打三反”中把被整对象吊起来打的情况，我劝他不要对别人说。在历次左的运动中，偃师总是左的典型，左得出奇。

返尉氏后，我和几位教师到杞县拖拉机修配厂，边劳动，边“探索”。几个月，什么也没有探索出来。

1971年5月，陈顺卿带领郑子桢先生、张世德同志和我，进开封动力机械厂，边劳动，边编写《机械制图》讲议。一直到10月中旬，教材也没有编出来，而我对牛头刨床的操作倒挺熟练。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